

族未來發展的規劃，讓年長的三個兒子經營產業，而專心培養年幼的二個兒子，讀書應考。張潛也因有能幹的兒子張由，在科第上不順遂之後，回家協助他處理家務。在父子齊心經營下，累積了豐厚的資產，乃得以聚集圖書，延聘良師，教育子弟，讓子弟專心學業，創造了經由科舉入仕的有利條件。這種出於統合治生與仕宦所做的規劃，是德興張氏家族晉升為地方名族的成功因素。張潛與張由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舉凡救災、造橋鋪路、排解糾紛等地方公務，莫不盡心盡力，藉此增加在地方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張潛在設立圖書館，延師授業的同時，也招納鄉里有潛力的青年學子如彭汝礪、熊本、劉正夫、程節等人，一起讀書，使得張家與德興新興士人家族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甚至以締結婚姻的方式，強化彼此的關係，使其社會網絡盤根錯結，牢不可破。這種種安排，使得張氏子弟與當地士人，由科舉入仕後，彼此援引，成為政治發展上互相支援的力量，這是張氏前三代很快崛起，並且發展成為德興乃至饒州名族的重要因素。影響張氏家族發展關鍵的人物張偕、張潛、張由等人，都是一介平民，其生平資料不見於《宋史》及現存宋人文集乃至方志中，幸賴墓志至今保存完好，其豐富的資料被收錄於陳柏泉編的《江西出土墓志選編》中(頁 81-89、91-94)，才能重建德興張氏家族的發展歷史。此外，由張垓所撰張燾的墓碣，也收錄在《墓志選編》中(頁 133-139)，讓我們對張燾個人及張氏第五代的情況有較清楚的認識<sup>22</sup>。

<sup>22</sup> 參見黃寬重，〈科舉、經濟與家族興替：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96)，頁 127-146。

### (三)浮梁程氏家族

浮梁程氏是宋代一個中型家族，從崛起到衰敗只有短短的三、四代，這種興替頻繁的情況，很能反映中國傳統社會家族發展的一般現象，在研究上別具意義。程氏原為新安望族，到五代時期，有一支遷居饒州浮梁，初期從事漁業產銷致富，到程暹時已成為浮梁的大姓。

程暹讓兒子程節與程筠致力學業，二個兒子在德興張氏所提供的私塾中受業，通過科舉考試相繼入仕。其中程節在仕途上的發展，即與幼時同學熊本有密切關係。熊本經營廣西時，奏辟程節為管勾機宜文字，擔任他的機要，這是引發程節長期在廣西措置邊防，最後位至安撫使，使他的功業由文事轉向武功。由於廣西居於宋西南邊陲的特殊地理環境，使程節得以進一步辟薦未第的兒子程鄰擔任他的機要。程鄰也從追隨、見習的過程中展現其才華，最後繼其父擔任宋鎮守廣西的最高長官，而且也沿襲其父的做法，再辟用未第的子侄程杲、程昇等人在廣西任職。這種特殊的際遇及成就，使浮梁程氏家族中雖然只有三人中舉，卻能三代在廣西擔任方面之寄，成為北宋中、晚期鎮守與開發西南邊區的重要家族。

從浮梁程氏家族發展的事例說明，宋人固然倚科舉為入仕及家族崛起的重要條件，但在特殊環境中，蔭補也能適度地維繫家族的發展。不過這種累代靠蔭補入仕的情況，對家族的發展固然具有穩定作用，卻也同時降低了家族的競爭力。由於蔭補也可以在仕途上有所發展，致使其後代捨難就易，失去了與在仕途發展較為優勢的科舉的競爭力，限制了發展的空間。奏辟入仕需要強有力的官員辟選，且要有表現政績的機會，在仕途上才有較好的發展。程鄰的英

年早逝、北宋晚期政局詭譎多變、聯金滅遼所引發的軍事外交行動及方臘之變等因素，使整個宋廷注意的焦點移至北方，無暇從事廣西的經營，這就限制了程氏第三代表現的機會，形成程氏家族發展上的一項障礙，也是導致浮梁程氏家族沒落的重要因素。

由於程氏父子均在地方任職，不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而且興盛時期僅有二代，雖不是曇花一現，也稱不上累世顯赫，程節、程鄰的生平事蹟並不顯著，《宋史》未立專傳，整部《宋史》也只出現五處，其他的典籍留存的資料也不多。幸好，新出土的江西墓志資料中，保留了父子二代夫妻四人的墓志<sup>23</sup>，使我們對這個家族的興起及其發展情形有進一步的了解<sup>24</sup>。

#### (四)鄱陽洪氏家族

洪氏原居新安歙縣，到洪士良時遷到饒州鄱陽縣。士良初務農，兩子早逝，他刻意培植兩位孫子洪彥昇與洪彥先讀書，致力舉業。長孫彥昇於元豐年間中進士，洪氏遂由地主家族晉昇為士紳階層。彥先子洪傷告登政和五年(1115)進士，不久，值兩宋之際的轉變，家族漸趨沒落。建炎三年(1129)洪傷告奉命北使，三位兒子洪适、洪邁、洪邁都年幼，生活艱苦。但三位兄弟奮發圖強，洪适與弟邁同中紹興十二年(1142)詞科，十五年洪邁又中詞科，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适受到孝宗的重用，於乾道元年(1165)拜尚書右僕射同中

<sup>23</sup> 見陳柏泉，前引書，〈程節墓志銘〉，頁 73-78，〈程節妻沈氏墓志銘〉，頁 79-81，〈程鄰墓志銘〉，頁 98-107，及〈程鄰妻陳氏墓志銘〉，頁 107-109。

<sup>24</sup> 參見黃寬重，〈宋代浮梁程氏家族的興替〉，《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排印中，中研院史語所主辦，1996年6.24-26)。

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與錢端禮、虞允文共掌政務。邁與邁，也分別官至資政殿學士及端明殿學士。至此洪氏不僅成為鄱陽的名門望族，更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

洪氏三兄弟位居高官，衣食無缺，因此對生產的莊園並不措意，反而在致仕後，花費鉅資整葺園圃，招集賓客、朋友，賦詩飲酒，享受山水林園的樂趣，如洪适在園圃中即種植九十種以上觀賞植物，馴養六種以上動物，營建四十座亭閣臺池等建物，遍求奇花異草，注重風雅。洪邁也整建了樓、圃、墅，皆以「瓊」字命名，以供欣賞、遊玩之用。這種種舉措，顯示洪氏在家族鼎盛之時，致力構建豪華的生活環境，重視生活享受，而未為家族儲備日後生活之資，使他們在晚年的生計面臨問題<sup>25</sup>。

自洪槻起是洪氏家族沒落的開始。适子槻以蔭補將仕郎，一生多在地方任官，雖有田園，卻無法供應家族全年食用之需，他重視買書教子，以清白傳家，生活節儉，死後留下的財產不多。部分洪氏子孫，過於注重風雅，生活轉為奢侈放蕩，而未能在仕途上有所建樹，如洪邁之子，在娼樓放蕩，導致洪邁辭職。邁個人也是心儀文人生活，家中始終蓄養聲妓，注重聲色享受，致使洪适和洪邁的子弟，不論在經濟或仕宦方面，都與洪氏三兄弟榮顯鼎盛之時，相去甚遠，然而榮顯時所形成的生活習慣卻揮之不去，如此一來，家道自然不復盛時，而出現每況愈下的景象。

關於鄱陽洪氏家族崛起至興盛的歷程，由於洪氏兄弟留下的資料甚多，加上《宋史》列傳的記載，使我們對這個家族的興盛狀況有清晰的認識，但其後代子孫中，除其子洪槻、洪秘及其孫輩洪芹

<sup>25</sup> 何晉勳，《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勢力的構成——以鄱陽湖地區為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頁 24-310。

外，資料不多<sup>26</sup>。陳柏泉編著的《江西出土墓志選編》則收錄二篇鄱陽洪氏家族的墓志，其一為洪适之孫、洪棨之次子洪傲，另一為洪邁之孫，洪椿之子洪揚。這二篇墓志是了解鄱陽洪氏家族在南宋晚期發展與變化的重要材料。洪傲字子度，生於寧宗慶元二年(1196)，以蔭補任官，歷任臨江軍新淦縣尉、福州古田縣丞、岳州錄事參軍、知信州弋陽縣，所至興教化、修學校。後任知沅州，提舉辰、沅、靖三州兵甲，以恩結溪峒，買田建學宮，以資貢士，節費築城浚池，救助貧困，沅人感念至深，理宗寶祐六年(1258)十二月死，享年六十三歲。從墓志中知傲有三兄弟及二妹，他生一男，名洪漢。傲早從諸老游，講明伊洛考亭之學。收匯其先世遺文，節儉成性，「當暑未嘗袒裼，食不兼味，衣止布帛」。文中說「文惠公(适)清白遺子孫，正奉公(佖)猶介特，二親即世，至無殮葬資。公竭力營辦，不以累兄若弟。」可見洪适晚年及其子孫的生活相當清貧<sup>27</sup>。洪揚字子成，為洪邁之孫、洪椿之子，生於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以蔭入仕，曾宰洪州豐城縣，遷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建康府糧料院等，卒於理宗景定甲子(1264)，享年七十九。妻鄒氏，有三男三女。揚篤志好學，以廉介自持，剛毅有守<sup>28</sup>。

## (五)眉州蘇氏家族

蘇氏的先世居於趙州欒城，唐神龍初(705-706)蘇味道遷居四川眉

<sup>26</sup> 周必大撰有洪棨墓碣，見《文忠集》，卷七十七；魏了翁撰有《洪秘墓志銘》，見《鶴山大全集》，卷七十一；洪芹事蹟見《宋史》，卷四二五。

<sup>27</sup> 《洪傲墓志銘》，《江西墓志選編》，頁225-231。

<sup>28</sup> 同上書，頁235-237。

州，是蘇氏家族居眉州之始。其後諸代，位皆不顯，資料不詳。蘇序時，善治生，有財產、喜為善，不好讀書，致力教其子受學。及其次子蘇渙中進士，蘇氏遂成為眉州望族，也影響蜀人的風尚，樂於讀書進學。序的幼子蘇洵，早年不學，結婚後，在妻子程氏的支持下，二十七歲始發奮為學，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其妻程氏主持家務之餘，親授二子蘇軾、蘇轍讀書。二子幼受庭訓，博通經史。至和、嘉祐間，蘇氏父子三人同至京師，受知於歐陽修，軾、轍同中嘉祐二年(1057)進士，時軾二十二歲、轍十九歲。歐陽修上洵所著權書衡論二十二篇，士大夫爭傳之，於是蘇氏文學遂擅天下。六年(1061)蘇氏兄弟又中制科，從此走上北宋中期新、舊黨爭的政治舞臺。由於二人忠直耿介的個性，在瞬息萬變的政局中，有著不同的遭遇。蘇軾得勢時，曾任通判杭州、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蘇轍也曾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的官位。失意時，東坡曾被以訕謗朝政實於臺獄，貶居瓊州等地，子由也曾累謫雷州安置、移循州。蘇氏父子三人，以文章名天下，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世稱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東坡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體涵渾光芒，雄視百代。三蘇的著作甚多，保留許多其家世、平生事蹟的重要資料，成為研究北宋中晚期政治、文學的重要文獻。

不過，由於蘇氏兄弟晚年在政治上遭逢政敵的貶抑，使其子孫承受黨錮牽連，或隨其居貶所，或居宜興、穎昌等地，東坡即有「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之歎。靖康之難後，政局紛擾不安，政權南遷，蘇氏子孫兩次分散，四處流離，有居許昌、眉山、宜興、婺州，甚或流落華北者<sup>29</sup>。由於正史缺傳，文獻難徵，故其子

<sup>29</sup> 舒大剛，《三蘇後代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4-5。

嗣行實多隱晦不明。現存文集中僅有蘇軾三子蘇過之資料，見晁說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堂墓志銘〉<sup>30</sup>，曾孫蘇峴的墓志見於韓元吉著《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一，其餘均散見史籍及文集中，十分零散。幸新出土的二件墓志銘，有助於了解二蘇後人的情況。一為蘇轍的次子蘇适及其妻黃氏的墓志，撰者是适的長兄蘇遲，全文達一千六百餘字，文中描述蘇轍被貶後，家人離散、生活艱難的情況及蘇适奔走之力，是了解蘇氏家族在北宋末年遭遇的重要資料<sup>31</sup>。另一篇則是東坡的孫子蘇符的行狀，撰者是蘇符的兒子蘇山，全文約一千字。蘇符是東坡長子蘇邁的兒子，字仲虎，建炎初改為宣教郎，曾知蜀州，紹興五年(1135)賜同進士出身，參與修《哲宗實錄》，紹興二十六年(1156)七月死，享年七十歲<sup>32</sup>，這是瞭解蘇軾家族在南宋初年活動的重要資料。這件墓志是一九八三年發現，先由張忠全發表於《四川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後又刊於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頁一八五。不僅可補《宋史》之不足，也是研究眉州蘇氏家族的重要資料。大陸學者舒大剛在《三蘇後代研究》一書中利用了這二篇文獻。

## (六)名人之先世與後代

宋代名臣中有不少人之先世或後代，由於現存文獻資料不足，無法考訂，以致對其家族發展所知甚為有限，甚或產生失誤，影響對史實的正確了解。從目前已公布的大陸出土人物墓志，使我們可以對若干名人的先世或後代，有更進一步的掌握，有助於了解這些

<sup>30</sup> 見晁說之，《景迂生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卷二十，頁20b-22b。

<sup>31</sup> 李紹連，〈宋蘇适墓志及其他〉，《文物》1973：7，頁63-69。

<sup>32</sup>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5冊，頁4310，作年六十餘，誤。

人的家族史。茲舉四例說明：

一、虞公著墓志銘。虞允文是宋指揮采石之戰，抗拒金兵的大臣，在孝宗朝歷任知樞密院使、參知政事及宰相等要職，提拔、推薦眾多名士參與朝政，被譽為中興名相之一。他為四川仁壽人，先世原居京兆，唐僖宗時，虞殷遷居隆州仁壽，在宋代成為仁壽望族。這個家族因虞允文而發達興旺，但允文以後的情況，只有其長子虞公亮一系，因魏了翁〈虞公(剛簡)墓志銘〉、趙方〈虞公(集)行狀〉及歐陽玄〈虞公(集)神道碑〉等資料，才有較多的了解。對其次子虞公著及三子虞杭孫的房支則所知無多。一九八二年，四川彭山縣文物調查組發現了虞公著及其夫人留氏的合葬墓，找到夫妻二人的墓志銘，使我們對虞公著及其子嗣有較清楚的了解。虞公著的墓志是其子虞普所撰。公著生於乾道元年(1165)，死於寶慶二年(1226)五月，享年六十二歲，生六子。其妻留氏的墓志為公著所撰。留氏為南宋孝宗、光宗二朝名臣留正的女兒，留正是虞允文提拔的士人，在他擔任四川安撫使時，將女兒許配給公著。留氏享年三十六歲。這二篇墓志對了解虞允文的後代，尤其次子公著一系，顯有助益。張邦煒先生撰〈宋元時期仁壽——崇仁虞氏家族研究〉即利用虞公著墓志，將這個家族的發展、變遷加以聯繫<sup>33</sup>。

二、張紘墓志銘。張浚是南宋初期著名主戰的大臣，關於他的生平事蹟及先世的資料，朱熹所撰〈張公行狀〉內容最詳<sup>34</sup>。據〈行狀〉所述，張浚為唐名相張九齡之弟九皋的後代，徙家長安，至張璠時隨唐僖宗幸蜀，徙居成都，至浚的曾祖張文矩時，因王均

<sup>33</sup> 參見張邦煒，〈宋元時期仁壽——崇仁虞氏家族研究〉，《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up>34</sup> 見《晦庵集》，卷九十五上，頁1-4a。

之叛徙居綿竹。張浚的祖父張紘爲文矩長子，於慶曆三年舉茂才異等科，爲張氏家族入仕之始。浚的父親張咸爲元豐三年(1080)進士，紹聖元年舉賢良方正，死於元符二年(1099)，享年五十二。朱熹對張紘生平的記載詳實，但仍有不足。一九三八年出土的〈武都居士墓志〉資料<sup>35</sup>，對張紘一生事蹟有更豐富的記載，可以與朱撰〈行狀〉相校。從紘的墓志知他生於真宗至道二年(997)，死於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享年六十七歲，妻趙氏。他家自曾祖父以來均未爲官，他因受到魚周詢與程戡的賞識得以入仕，並二次擔任程戡的機宜文字的工作，後改知雷州。志文中對紘在海南的建樹與教化都有詳細的記述。這一篇墓志配合朱熹的〈行狀〉有助於我們了解張浚的先世。不過墓志說紘有四子：鉅、鎰、鉞、錡，未見咸名，查紘死時，咸已十六歲，或爲庶出，或爲幼子錡改名，待考。紘五位孫男中亦未見張浚之名；浚生於紹聖四年(1097)，紘死後三十四年才出生。〈墓志〉與〈行狀〉對張浚有若干記述，仍待進一步探究。

三、翟高墓志銘。靖康之難後，華北民間武力掀起大規模的抗金行動，在敵前牽制、敵後游擊上，發揮了很大抗敵效果，使南宋朝廷得以從容建立，奠定了偏安的局面。而據守各地的義軍，像王彥率八字軍守太行山，馬擴等奉信王榛守五馬山，李彥仙在陝州，翟興兄弟、父子守洛陽，邵興在解州等，在敵後游擊，都相當程度地發揮牽制作用，緩和了南宋政權直接受敵的壓力。其中雄踞在洛陽的翟興、翟進兄弟，在建炎三年(1129)，太行山、五馬山抗金武力被金兵摧殘後，成爲華北義軍最重要的支柱，不僅先後大敗金兵於

<sup>35</sup> 〈武都居士墓志〉，見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頁151-153；又見寧志奇，〈北宋武都居士張紘墓銘〉，《四川文物》1993：5，頁38-39。

洛陽及陽城縣，使金人及偽齊深受威脅。而其據守洛陽，對劉豫政權更如芒刺在背，乃策動內應與外攻並進，使翟家的據點被毀。翟進先死於建炎三年(1129)，翟興與其子翟琮又分別死於紹興二年(1132)及三年(1133)。翟氏家族在洛陽抗金的事蹟，《宋史》卷四五二〈忠義傳〉所記較豐，但對此後家族發展，則所知有限，幸賴江西出土的翟高墓志銘，彌補了這段空缺。翟高是翟進的兒子，生於宣和七年(1125)，以父蔭補官，死於淳熙十三年(1168)，享年六十二歲。從墓志知道，翟氏爲河南府伊陽甲族，翟高的曾祖父翟宗、祖父翟榮、父親翟進，翟興是他的伯父。翟進與其子翟襄均驍勇善戰，屢挫金兵。進死後，翟襄南下，曾擔任江西副帥，乃舉家南遷，居於江西南昌。翟高以蔭入仕，官職均不高，卻勤於任事。不過他在擔任荆南府松滋縣簿尉之前，母親去世，任滿後獨子翟恂又死於歸途，妻孫氏及女也都先死，可謂晚境悲涼。翟高有孫男三人、女一人。這一篇墓志使我們對翟氏先世、遷徙及翟進一房的情形有較深的認識。

四、張同之墓志。張孝祥學者稱爲于湖先生，詞學造詣深厚，文章翰墨獨步當代，一生主戰，是南宋初期主戰抗金的重要朝臣之一。孝祥字安國，本貫和州烏江人，唐名詩人張籍後裔。紹興初，隨其父張初渡江居蕪湖。紹興二十四年(1154)中進士第一，曾上疏爲岳飛鳴冤，爲秦檜所不喜，歷任校書郎、禮部員外郎、中書舍人等職。先是孝祥出自湯思退之門，後受知於張浚，主戰，遂不爲思退所悅。孝宗朝，曾任知靜江府、知潭州、知荆南府等，乾道五年(1169)致仕，不久死，享年三十八歲。張孝祥的後裔，當時史籍所記不多，《宋史》本傳也失記，陸游在張郊的墓志中未記孝祥、同之等名，使張氏的張邵、張祁與張郊的資料均不詳，只有謝堯仁在《于湖集》序中提到「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通五達

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遭於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屢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塞通亦自有時」<sup>36</sup>，說出同之是孝祥之子，但同之的生平事蹟則無從稽考。一九七一年三月江浦縣出土的張同之夫婦墓志，讓我們知道孝祥後裔的情形。張同之字野夫，當為孝祥之妾李氏所生，以孝祥致仕恩授承務郎，歷任兩浙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官、提轄文思院、將作監主簿、司農寺丞、知滁州、知舒州，慶元元年(1195)除直秘閣，移江西路轉運判官，次年因病死於官舍，享年五十。娶韓氏早死，繼娶章氏，為吳興人章冲之女，章氏之母葉氏為葉夢得之女。章氏二十三歲嫁同之，生三子，張億、張備以蔭入仕、張俟早死，女嫁董鑒。章氏於慶元六年(1200)死於里第，享年四十七歲<sup>37</sup>。同之雖以蔭入仕，但在軍政、經濟方面均有所建樹，慶元元年(1195)淮西大饑，同之賑荒尤力，民賴以安，是一位關心民間疾苦的好官。他任官之後，為生母李氏爭取在張氏家族的地位。總之，這一墓志讓我們對張孝祥的一生及其子嗣的情形有更充分的認識。黃佩玉教授在所著《張孝祥》一書中<sup>38</sup>，就利用這份墓志結合其他史籍，對張孝祥與同之父子關係，作了相當深刻的描述。

## 六、一般人物資料及所反映的歷史現象

在近一百七十件《宋史》無傳的出土宋人墓志中，收錄了相當多角色各異、出身不同的人物，這些人物墓志所反映的面相，對瞭解當時的社會現象更有代表性、更具研究意義、史料價值更高。由

<sup>36</sup>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于湖集·序》，頁2b。

<sup>37</sup> 見〈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4，頁59-66。

<sup>38</sup> 《張孝祥》(香港：三聯書店，1993)。

於資料的代表性繁富，難以一一列舉，本文只介紹其中十二件，謹供參考。

一、趙汝适墓志：這是一九八三年在浙江臨海縣發現的。趙汝适字伯可，生於孝宗乾道六年(1170)，為宋太祖八世孫，以蔭入仕，慶元二年(1196)中第，自此步步遞升，宦海生涯，絕少閑居。嘉定十七年(1224)除提舉福建路市舶，寶慶元年(1225)兼權泉州，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三年除知安吉州，擔任提舉福建市舶司凡二年九個月。死於紹定四年(1231)，享年六十二歲，娶陳氏，生二子。所著《諸蕃志》是一部記述中國與海外各國貿易、交通方面的著作。這一墓志的發現，解決了《宋史》及方志對趙汝适平生無考的困境。

二、宋德章墓志：一九九一年九月，四川蒲江縣發現了南宋中期，在四川、陝西、甘肅等地方任官的宋德章的墓志，文長二千五百九十餘字，是四川自一九三八年起出土宋人墓志中，文字最長的墓志銘。撰者為其兄宋德載。德章字粹中，生於建炎三年(1129)，淳熙元年(1174)參加四川類省試，獲主司李夔賞識，登乙科第一，先後任大安軍、金州教授、鳳州通判、知石泉軍，卒於慶元三年(1197)，享年六十九歲。墓志除記載宋氏先世、德章生平、仕履、著作外，也記宋氏家傳《春秋》之學，可補正宋代史志之闕，對研究宋代川、陝、甘地方，提供了豐富的新史料。撰者與德章為親兄弟，從墓志中可見其父對兄弟二人教育的重視及感情的親密。

三、侯嚴及其妻施氏墓志：這二塊墓志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北浠水縣城關鎮出土的。墓主侯嚴字仲修，為湖北蘭溪人，生於景祐三年(1036)，死於元祐四年(1089)，享年五十四歲。嚴之先世皆不仕，其父喜以營生致富，侯嚴本專致學業，迨其父逝世，轉而繼承祖業，不數年間資產鉅萬，為圻州著姓。家中原有宅第百楹，侯嚴嫌不足以庇風雨、遺子孫，乃鳩工度材，闢基廣構，建造華廈，甲於江

淮、圻州。夫人施氏爲江西臨川人，先世皆不仕，以財雄江西，爲巨族，其父施延壽遊圻，乃定居於蘭溪，夫人生於明道元年(1032)，死於紹聖元年(1094)，享年六十三歲。墓志說侯氏資產甲蘭溪，內外百口義聚三十餘年，施氏奉上撫下，舉族無間言，樂教子弟，勸其夫設家塾，延請儒者爲師，好善樂施，平居好誦佛書。侯氏夫妻墓志讓我們對宋代家業富實的商人家庭，有進一步的認識<sup>39</sup>。

四、吳忠嗣墓志：吳氏生於乾道七年(1171)，其父爲吳璘庶子，未獲襲爵。忠嗣爲吳曦之兄弟，原名不詳，字明叔。吳曦於開禧三年(1207)叛宋降金。時明叔任武連宰，堅持不隨曦降金，及曦事敗被誅，吳璘子孫均受牽連，移徙出蜀。叔明因當地士民、官衙，乃至四川宣撫使安丙，均證明其不附逆之事實，宋廷特令免連坐、免移徙，官使仍舊。叔明恥累同姓，乞更名，宋廷特賜易名忠嗣，後任洋州觀察推官、儒林郎，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死，享年四十七歲。妻王氏，早逝，再娶王氏妹，生三子一女。這件墓志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在陝西南鄭縣境出土，墓志對了解吳曦叛宋時，族人的動向有所助益。

五、張守節墓志：一九八四年西安雁塔區出土宋廣南西路兵馬都監騎都尉張守節墓志。守節字堯魯，生於天聖六年(1028)，以父蔭補初官，累遷廣西都監，凡七任皆有能績，娶李氏爲妻。熙寧八年(1075)冬，交趾叛，陷欽、廉，攻邕州，廣西騷動，經略使劉彝與守節議禦敵計，守節請求領兵援邕。當時桂兵不多，強壯者均先遣，所餘二千人屬老弱之輩，守節嚴整軍旅，倍道兼行，扼守昆倉關以圖進取。廣西監司不知兵，而妄處軍前事，認爲守節觀望不進。守

節明知速戰不利，仍拔營而前。交人乘機挾眾迎擊，守節力戰而死，全軍覆殘，邕州隨之而陷，享年四十八歲。張守節的墓志，對吾人了解神宗時宋與交趾的和戰有所助益<sup>40</sup>。

六、彭合行狀：彭合字子從，江西吉州廬陵人，生於元祐八年(1093)，以父恩補將仕郎，參吏部選，任清江縣主簿，勞績甚著，歷官興縣丞、知贛州信豐縣、臨江守，廣西提點刑獄等，官至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紹興三十一年(1161)死，享年六十九。彭合久歷江西、湖廣地區州縣官，對地方政事之瞭解甚爲深刻，治績顯著；如在信豐縣行保伍之法，興建學校，鼓勵士子讀書，以移風俗。守臨江時，適逢災荒，合盡發義倉救民，提點廣西刑獄時，馭吏曉民以理，以息訟。行狀凡二千五百餘字，對南宋時江西、廣西、湖南地方吏治所記甚多，可補史籍記載之不足<sup>41</sup>。

七、姚錫墓志銘：姚錫字予善，先世居吳興，五代時遷居靈源，其父姚且以儒起家，生徒數百人，以八行舉，擢上第，任黃州教授。宣和三年(1121)錫生於黃州，三歲而孤，由母鄒氏撫養，自幼勤於學，屢試不第，四十歲(1160)才以恩釋褐，任吉水縣主簿、武當軍節度推官、光化軍判官、汀州判官等，淳熙十一年(1184)九月卒於汀州官舍，享年六十五歲。姚錫久歷地方基層官職，墓志中對他任事的勞績所記甚詳，從其中可以看到南宋許多地方吏治的實況。由於姚錫任職的武當軍、光化軍都屬宋金邊境，從墓志的記載，可以瞭解宋金邊境的若干訊息，如在武當軍組織民兵爲備，在光化軍面對金兵逾境的處置、植林防敵的安排，以及平反北人南遷後被疑爲

<sup>39</sup> 見〈浠水縣城關鎮北宋石室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9：3，頁11-17。

<sup>40</sup> 見李興華，〈西安發現北宋張守節墓志〉，《文博》1986：2，頁94。

<sup>41</sup> 見《江西出土墓志選編》，頁128-133，陳柏泉記彭合爲紹聖四年(1097)進士，誤。

奸細等，不僅對姚錫個人事蹟有所認識，也有助於了解當時宋邊境上的吏治及吏民活動實況<sup>42</sup>。

八、黃景通壙中記：這是一篇父親為兒子撰寫的壙記，全文約五百字。景通字孟泰，世居南康之都昌，為黃應慎之子。生於紹定二年(1229)，出生後即體弱多病，母親劉氏甚為鍾愛，照顧備至，但為痰癥所苦，每次發作，日夜不停，一年中大半為病所苦，家人引為憂。十九歲時，其母死，遂由其父照料，寶祐元年(1253)九月死，年二十五歲。景通年幼時，曾與其表妹王氏議婚，未婚而卒。景通雖疾病纏身，但喜愛讀書，「雖痰疾顛連，暴寒相半，然苟有一日之安，則曉案細書，夜夜窗誦，不肯輒廢」，也希望與其他士子一樣至學校受業，作文亦頗可觀。這是宋代少數出土墓志資料中，記錄殘疾人士艱苦勤奮，而英年早逝的歷程<sup>43</sup>。

九、郡主趙若雲墓志：這是趙宋宗室女的墓志，郡主名若雲，為魏王廷美的後裔，生於淳祐元年(1241)，自幼為外祖母吳氏所鍾愛，十六歲(1256)嫁費淮俊。淮俊自幼失怙恃，入贅於趙家人。景定二年(1261)，郡主與淮俊自湘入嶺南，輾轉流徙，身染瘴疾達七年。咸淳五年(1269)，趙若雲以病死於廣西梧州舟中。次年淮俊運歸故鄉，賴其外舅捐火旱壙山地，乃得以下葬。這篇墓志是由其夫費淮俊所撰，文中看到晚宋宗室女與其夫顛沛流離，生活落魄的情形<sup>44</sup>。

十、道士高養素壙記：這是由徒弟為師父所撰的壙記。高養素字浩然，是江西隆興之進賢人，生於嘉定八年(1215)，自幼厭塵緣而樂清致。其舅李善時為南華山開山道士怡庵侯黎師的徒孫，養素自

幼與善時諸徒游南華山，感於觀宇湫隘，乃與其舅謀改創鼎新南華山。在他們的努力下，終於創立棲真樓、觀藏殿，所有廊廡寮需用器物，一應俱全。養素又感於觀宇須有人常住，景定元年(1260)，利用陸氏油燈費，先後在洪州、撫州購置田地十二頃，作為支持人員常住的費用，使道觀得以壯大、持續。養素自以壯歲為道士，學業不深，乃期勉弟子讀書，並多與士大夫交往，而以興崇道門為職志。咸淳八年(1272)十一月死，享年五十八歲。從這篇壙記，可以看到高養素經營南華山道觀的努力與用心<sup>45</sup>。

十一、張確及其妻杜氏墓志：這二篇墓志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成都東郊出土的平民資料，張確字守道，生於仁宗天聖元年(1023)，死於元豐四年(1081)，享年五十九歲。張確的先世在五代時已富甲一方，避亂不仕，及孟氏納土，宋廷詔豪貲至開封，張元貴曾偕其子張尚至京師。元貴死，尚護喪還蜀，置田娶妻，生確等五子。確力學不第，乃致力殖產，而急於救貧。妻杜氏生於天聖元年(1023)，死於元祐五年(1090)，享年六十八歲。杜氏先世為京兆人，後遷蜀，為邛郡著姓。夫人自幼即以善於理事聞名，與張確結婚後，勤於家務，使家道日隆。張氏夫妻的墓志中有一件胥吏構陷張確兄弟的事例，從中可以看到胥吏在地方的惡行及杜氏應付危難的能力。當時胥吏欲羅致張確之兄張礪之罪，張確救兄，吏追捕，杜氏勸其夫避去，阻止其子張無逸出庭，反而親自應訊，以智慧化解危機。杜氏在危急之際，以全身解張氏家族之憂，是一位智勇俱全的女性<sup>46</sup>。

十二、李氏五小娘子墓志：這是一九五八年在鄂州西山寒溪邊

<sup>42</sup> 同上書，頁 167-170。

<sup>43</sup> 同上書，頁 221-222。

<sup>44</sup> 同上書，頁 240-242。

<sup>45</sup> 同上書，頁 246-247，本篇標點錯誤甚多。

<sup>46</sup> 見翁善良、羅偉先，〈成都東郊北宋張確夫婦墓〉，《文物》1990：3，頁 1-13。



出土的資料，墓主是一位年僅十九歲的未婚少女五小娘子。作者是她的父親李愬。李氏生於熙寧六年(1073)，是李愬的第三女，生而秀整，眉目如畫，父母期望她將來嫁作貴人婦，以光大門楣。建中靖國元年(1101)，李愬受命赴鄂州任咸寧縣令，到半途李氏生病，醫治無效，死於武昌縣之寒溪寺，僅十九歲。其父將之殯於寒溪寺的西廡，是年六月李愬回淮南奔喪，次年四月回任所的途中，才正式葬李氏於武昌縣洪道鄉，停柩於寺廟達十五個月<sup>47</sup>。

## 七、結語

近五十年來，由於中國大陸考古與歷史工作者的努力，在宋墓的發掘上，已累積不少可貴的資料，獲致了可觀的成果。如河南地區自一九八〇年以來，除開封宋城的鑽探與試掘，有助於世人瞭解北宋東京城的面貌，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的發掘，使宋陵地宮的全貌及玉冊得公諸於世之外，馮京、王拱辰和楊承信三位宋名臣墓志的出土，則可補正《宋史》本傳記載的缺遺，范致祥的墓志也可對范氏家族由福建移方城，及兄弟五人任官的情形有所了解<sup>48</sup>。此外，像福建黃昇墓、金壇周瑀墓，則出土了豐富的器物與文獻，對了解宋代科舉制度、服飾、社會與文化現象，都有很大的幫助。

本文由於篇幅的限制，只能列舉若干案例，說明近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出土的墓志資料，對研究宋代歷史的價值。這種列舉式的說明，誠然包含筆者個人對資料的主觀選擇，無法反映資料的多方面

意義。但從上述各節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到這些資料，既有著名文臣在其文集所失收的文獻，也有足資補充、修正《宋史》相關人物事蹟記載的缺失。同時，透過這些出土的墓志資料，也可以使我們對一些宋代著名朝臣的先世及後裔有所了解，有助於研究這些家族的發展與變遷的歷史，其中有若干資料，更是重建家族歷史的重要文獻，如河西折氏、德興張氏、浮梁程氏、鄱陽洪氏及眉州蘇氏。此外，這些墓志與文集、方志中所見許多在宋代史傳中沒有傳記的人物墓志一樣，讓我們對宋代低級官員、平民、商人、婦女乃至少女、殘障者、道士等，不同階層的人物及其反映的社會現象、政治環境乃至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情境，均有較多的認識與掌握，對宋史研究具有積極性的意義。因此，儘管本文所能提供的只是眾多原始資料中的一小部分，相信若能經由本文的介紹，讓研究者獲得更多資訊，則可以促使研究者進一步去探尋不同性質的史料與內容，擴大研究資源，開展研究議題與領域。這也是筆者撰述本文的用意。

這些出土的墓志資料，有一小部分是由宋史研究者整理考訂的，由於清楚史事的發展，較能揭示史料的價值，加以考訂、點校嚴謹，因此多能凸顯史料的重要性，如徐規先生介紹趙汝适的墓志、朱瑞熙介紹周應合之女、顧吉辰補釋任氏墓志等，對研究者提供了詳實可靠的史料，對宋史研究是很有貢獻的。然而絕大部分的資料是考古發掘中出土文物的一部分，考古學者對文物、圖像的興趣大於墓志文字，以致刊布考古成果時，或有圖無文，或有文無圖，致無法比對、查核，或只摘述部分內容，無法窺得全貌。即使已摘錄刊布的墓志資料，也常常因報告人對史事的背景未能充分掌

<sup>47</sup> 熊亞雲，〈鄂州出土墓志、地券輯錄及討論〉，《東南文化》1993：6，頁36。

<sup>48</sup> 李見孫新民：〈十年來河南宋元考古概述〉，《華夏考古》1989：3，頁56-62。

握，致有點校誤謬、校對不精等現象，甚至有考訂錯誤的情況出現<sup>49</sup>。因此，建議有意利用這些資料的學者，應該進一步去查核、考訂，不宜無條件地接受這些報告及其說明。

<sup>49</sup> 考訂錯誤，在此舉二例，如陳柏泉，〈吳鐸妻雷氏墳記〉，《江西出土墓志選編》，頁224，應作〈吳媿妻雷氏墳記〉；又崔成實，〈浙江衢縣出土宋鐵鑄張氏墓記〉，《文物》1979：8，頁95，將墓主張氏記為劉正夫之妻，誤，按墓志所載張氏之夫為劉正夫之侄劉媿，而非正夫。

## 本文引用之出土宋人墓志資料：

### (一)期刊部份

作者	篇名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時間	起迄頁數
譚淑琴	略談宋代元符年間一組幼兒墓志	史學月刊	1994:5		p.87-89
浠水宋墓考古發掘隊	浠水縣城關鎮北宋石室墓發掘簡報	江漢考古	1989:3	1989年9月	p.11-17
洛陽地區文物工作隊	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	中原文物	1985:4	1985年12月	16-23, 15
陳顯遠	南宋吳忠嗣墓志銘初考	考古與文物	1987:6	1987年12月	p.96-97
應新	陝西府谷縣出土北宋李夫人墓志	文物	1978:12	1978年12月	p.90-92
陳定榮	李綱書丹的宋張由墓志銘	文物	1986:1	1986年1月	p.73-75
南京市博物館	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	文物	1973:4	1973年4月	p.59-66, 55
李興華	西安發現北宋張守節墓志	文博	1986:2	1986年3月	p.94
朱錫友	張孝祥墓碑的發現及墓在江浦考	東南文化(文博)	1983:1		p.35-38
翁善良、羅偉先	成都東郊北宋張確夫婦墓	文物	1990:3	1990年3月	p.1-13
寧志奇	北宋武都居士張紘墓銘	四川文物	1993:5		p.38-39
周夢江	南宋曹黜墓志	宋遼金元史	1988:6	1988年12月	p.4
南城縣博物館	南城宋陳肅墓清理記	江西文物	1989:2	1989年10月	p.25-2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文物保管所	密縣五虎廟北宋馮京夫婦合葬墓	中原文物	1987:4	1987年12月	p.77-90
徐三見	浙江縣臨海市發現宋代趙汝适墓志	考古	1987:10	1987年10月	p.956-957

周到	宋魏王趙頤夫妻合葬墓	考古	1964:7	1964年7月	p.349-354
李紹連	宋蘇适墓志及其他	文物	1973:7	1973年7月	p.63-69
戴應新	北宋〈折繼閔神道碑〉疏証	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1979	1979年	p.446-458
戴應新	宋〈折克行神道碑〉考釋	文博	1987:2	1987年3月	p.64-72
龍騰	蒲江縣宋朝散大夫宋德章墓出土文物	四川文物	1995:2	1995年4月	p.65-70
蘇健	宋中書令李昭亮神道碑調查	中原文物	1995:2	1995年6月	p.98-01
熊亞雲	鄂州出土墓志、地券輯錄及討論 <sup>50</sup>	東南文化	1993:6	1993年12月	p.34-41

## (二)專書部份

墓志名稱	年代	墓誌記載時間	出土地點	出版處
朝奉郎陳肅墓志銘	北宋	至和二年二月	江西	《江西出土墓志選編》 <sup>51</sup>
天章閣待制劉瑾墓志銘	北宋	元祐二年一月	江西	同上
洺州守王純中墓志銘	北宋	元祐二年十二月	江西	同上
徐必府君墓志銘	北宋	元祐七年十一月	江西	同上
寶文閣待制程節墓志銘	北宋	崇寧三年十二月	江西	同上
寶文閣待制程節妻沈氏墓志銘	北宋	崇寧四年十二月	江西	同上
通直郎張潛行狀	北宋	大觀元年三月	江西	同上
將仕郎張由墓志銘	北宋	政和八年閏九月	江西	同上
徽猷閣待制程鄰墓志銘	北宋	宣和二年十月	江西	同上

<sup>50</sup> 本文包含三篇墓志：李深之墓志、李深之之妻龔夫人墓志、李氏五小娘子墓志。

<sup>51</sup> 陳柏泉編著，《江西出土墓志選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徽猷閣待制程鄰妻陳氏墓志銘	北宋	宣和二年十月	江西	同上
戶部郎中彭合行狀	南宋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江西	同上
資政殿大學士張燾墓碣	南宋	乾道二年十二月	江西	同上
汀州判官姚錫墓志銘	南宋	淳熙十二年十月	江西	同上
松滋簿尉翟高墓志銘	南宋	淳熙十三年八月	江西	同上
資政殿大學士施師點壙志	南宋	紹熙五年五月	江西	同上
儒生黃景通壙中記	南宋	寶祐元年十一月	江西	同上
朝議大夫洪徽墓志銘	南宋	開慶元年十月	江西	同上
瑞州知郡院洪傷墓志銘	南宋	景定五年十一月	江西	同上
郡主趙若雲墓志銘	南宋	咸淳六年三月	江西	同上
道士高養素壙記	南宋	咸淳九年十二月	江西	同上
武都居士墓銘	北宋	嘉祐七年·綿竹	四川	《四川歷代碑刻》 <sup>52</sup>
趙懿簡公神道碑	北宋	元祐七年·大足	四川	同上
蘇符行狀碑	南宋	紹興三十一年·眉山	四川	同上
虞公著墓誌銘	南宋	寶慶二年·彭山	四川	同上

<sup>52</sup> 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